唐风入世：AI与新质生产力让唐纹样“活”在当下

□西安工程大学新媒体艺术学院 李德兵

唐代是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发展的巅峰时期，服饰中的各种纹样就像一幅细腻的历史画卷，蕴含着盛唐时期的等级规范、审美偏好以及丝绸之路文明交融的痕迹。这些华美的纹样大多都只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还有考古研究报告里，大众隔着玻璃只能看到它们的外形，却很难触及背后的文化温度与生活气息。在当下的数字发展进程中，怎样让这些纹样从沉寂状态转变过来，不再只是静态的文物陈列，而是变成能让人感受体会、参与互动、协同创造的文旅相关内容形式，是当前亟待破解的现实课题。近些年来，文旅领域的数字化应用在不断拓展，AI生成内容技术也在不断发展，给文化类古迹的活化与传播带来了新的方向。立足这样的发展契机，有专业人士提出“向内梳理+向外创作”的双向思路，把AI技术作为激活尘封传统图案的重要依托。

一、唐代纹样：一段亟待激活的文化记忆

唐代各类服饰纹样的实物留存，大部分是来自陕西法门寺地宫、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群以及日本正仓院。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线绣制袈裟，其上有各类丝织面料上的纹样，如联珠配禽鸟、宝相花卉、团簇瑞兽等，这些纹样有宫廷特征，是金线绣制。阿斯塔那古墓群靠着干燥的保存环境，留存了不少用蜡缬、夹缬工艺制成的织物，其上的狩猎类图案、花卉类纹样，还有几何类纹饰，都体现出丝路文化交汇融合的世俗审美意趣。敦煌莫高窟壁画创作耗时三百年，其人物服饰纹样有供养人、乐舞伎等，团花、卷草、联珠等纹样随时间变化、依人物身份体现礼制准则。唐代的各类装饰纹样，从初唐那种简练且细腻的花饰，到盛唐那繁复又华丽的纹样，再到晚唐柔和且柔美的缠枝花鸟，逐步构建出包含植物、动物、几何图形、宗教意象的四大类别，从而构建起规整协调的视觉表达体系。联珠这类纹饰的源头能追溯到萨珊波斯，它以圆形珠圈来包裹各种动植物题材的纹样，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土后得到广泛运用。宝相花纹把莲花、牡丹、忍冬等多种纹样元素整合起来，勾勒出均衡丰盈的圆形纹样框架，有佛教清净境界和社会鼎盛的双重寓意。初唐窦师纶打造了陵阳公样，此纹样多以配对的禽鸟兽类为主题，专供帝王宗室与朝廷高官使用，有着尊贵典雅之意。唐代服饰纹样的历史文化价值，就是它作为盛唐社会制度、民族融合以及丝路交流的视觉载体。这套纹样框架有等级区分的规则，还把胡地和中原元素交织共生，像宝相花、忍冬纹这类来自西域的装饰，经过本土化改造后被广泛使用。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的纹样有120多种，这些纹样包含宗教、自然和几何题材，是工艺美术的实证，也是“一带一路”文明互鉴的历史见证。在当下文旅相关场景里，这种唐代服饰的纹样有着三处现实问题，这三处问题不容忽视。一是展示静态化。传统文博展馆大多依靠图像、文字或者高精度复刻品来展示，缺少动态展演和场景还原这一环节，观展者只能被动接收各类信息，很难真正理解纹样背后深层次的含义。二是转化浅层化。文创类产品大多只是浅层地借用传统符号，普遍做法是直接把宝相花、联珠纹等纹样截取后用在产品上，没考虑纹样的构图逻辑、等级寓意以及背后的文化联系，设计出的产品相似度高，重复购买的比例也比行业平均水平低。三是供给标准化。传统的内容产出环节，从业者手工绘制，专业人士核验，耗时长，成本高，不能满足用户对个性化内容和即时内容的需求，大部分年轻人想获取能自己调整、有交互性的内容。

二、向内整理：构建唐代纹样的数字谱系

针对现有研究中存在的碎片化、考据不足等情况，本文拟提出一种推进路径：向内梳理+向外创作。其中，向内整理的关键就是依靠系统化的文物采集、语义分析以及学术标注，构建起结构化、标准化的唐代纹样数字谱系，以此来筑牢文化传承的真实基础。依托陕西历史博物馆、法门寺以及敦煌石窟等文化资源，系统搜集唐代织物、金银器、陶俑、壁画的高分辨率影像样本，同时严格按照《唐代服饰制度》《中国纹样史》等权威典籍，从形态演变和文化内涵这两个方面进行交叉验证并深入剖析。在此之上构建了450个样例库，其中有多标签字段的语义标注体系。形态特征包含纹样名称、类别、结构、色彩配置以及对称方式。内涵特征的追溯、社会功能的阐释以及宗教意蕴的解析，还有等级规制的明确，都需被追溯。该体系的数据达标率很高，能有效防止主观臆断和历史误读，给后续人工智能生成模型提供了高质量、可溯源的语料支撑。该研究以严谨框架为基础，系统构建了唐代纹样规范化数字谱系，实现了脉络清晰，结构分明的目标。谱系内的各类纹样都经过严谨的学术考证与交叉核验，保证其文化根源清晰，历史出处准确可考。在此基础之上，项目引入人工智能技术，着重采用色彩网络分析法，深入剖析传统纹样的色彩组合，准确量化各种色彩间的内在联系及搭配规律。这项工作不光实现了唐代纹样的系统性数字化建档和科学化视觉还原，而且从理论支撑和技术路径这两个方面，为它在当代设计中的创造性转化和跨媒介创新应用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向外创作：AI让纹样精准“重生”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为传统纹样的精准重生带来新的途径。在数字创作中，依靠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可对已梳理的纹样数字资产进行智能复原、风格衍生、虚拟场景搭建，让纹样承载的深厚文化内涵得以精准传递，还能进行当代阐释。该技术的落地首先依赖于高质量的数据底座。在文化数据的数字化记录工作中，要综合运用高精度三维扫描、多光谱成像以及微距摄影等无损采集方法，全面记录唐代丝织品、金银器及古代壁画上的历史纹样。之后借助图像分割、矢量处理以及专业色彩校准，剔除岁月侵蚀造成的视觉干扰，构建一个结构清晰、色彩准确的专属数字资产库，为模型训练筑牢基础支撑。生成模型的关键突破就是三重限定规则能深度协同起来。首先，对文化内涵予以专家级的专业标注，从源头上保证语义的学术严谨性。其次，针对古代纹样的构图逻辑和线条韵律，要不断优化底层算法，让模型切实掌握传统美学的生成规律。再次，在推理生成阶段要对形制规制进行严格限制。三者相互校验，能够有效解决通用大模型常出现的历史错位以及风格拼贴问题，让输出成果在文化脉络和视觉风格上都高度还原。在内容调控方面，系统运用标准化引导词框架，把古代礼仪制度和工艺规范有机融入创作流程中。比如在生成唐代五品官员服饰纹样的时候，提示词会精准地限定盛唐时代背景、五品官阶身份、团窠状宝相花构图、蹙金绣制作技法以及朱红底色风格等关键参数，从而强制模型在既定历史语境下进行推演。通过对中国经典传统祥瑞纹样“凤鸟纹”的研究表明，此技术路径可实现高精度修补残损纹样，并能衍生出符合当代审美且保留古典气韵的新唐式风格图案，其文化正确性有了明显提高，成功避免了通用模型的认知偏差，为传统纹样的数字化活化和跨媒介传播提供了科学可靠的技术范式。

四、场景落地：从展柜到沉浸式体验

理论突破最终需落实于具体场景。相关团队对四大场景进行落地实践，以促进传统纹样渗透现代生活场景。博物馆展陈依靠语音和手势交互，把纹样的构成逻辑以及唐代礼制的关联应用动态解析出来，从而清楚梳理出经典纹样的设计脉络。沉浸式舞台表演会把这种纹样变成实时生成的视觉效果，演员动作下，灵动的粒子光影就显现出来了。文创消费打造一个完整的链条，把专属定制和快速生产结合起来，让人工智能快速产出兼具历史内涵与实用价值的相关方案。线上云文旅以数字分身穿搭和虚拟漫游为主，还植入纹样解密彩蛋。经梳理总结可知，有三类路径：文化语义锚定模式能给生成式模型划定专业范畴，避免出现曲解偏差；场景叙事驱动法以纹样为线索串联时空语境；使用者参与共同创作的模式可减少内容制作的难度，利用穿搭更换和场景漫游等互动形式提高趣味性，从而达到文化动态传承的效果。

五、生成式活化：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跃迁

这项研究的核心成果就是创新地提出了“生成式活化”的理念。以往对文物进行数字化保护的工作，大多只是把原物复刻成静态的产品；而生成式活化这一理念的核心就是，文物保护的最终目的不是单纯把文物静态保存，而是要让文物深入当代社会的生产生活脉络，实现价值的活化转化。AIGC技术在这个研究中，不再只具有文物还原的简单功能，它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增值的关键媒介，让文物从被动保存转变成主动再造。本研究所提出的“纹样叙事场”概念，突破了以往相关研究把服饰纹样当作单独装饰符号的固有认知，把原本单独的唐代服饰小纹样拓展成兼具时代特色和文化内涵的盛唐整体场景，构建起“一纹含万象”的视觉叙事思路。受众能够凭借具象的纹样，深刻体会到盛唐社会的风貌、审美情趣以及文化根基。相关探索构建起“资源、技术、场景、体验”循环落地的路径，为数字化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提供一个能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例。

六、展望：让纹样活在更广阔的未来

唐代纹样的活化探索仍有广阔空间。纹样相关的数据覆盖范围正在逐步扩大，相关模型对历史语境的深层理解也一直在加深。随着元宇宙和跨界产业应用的不断推进，纹样将在更广阔的数字空间及产业生态中得到发展。从封闭的展陈模式转变为日常化融入的方式，从静态的形态转变成动态的展示方式，从被动的观看转变为主动的参与，AI正持续开拓文化遗产活化的新的可能性。唐代传统纹饰历经漫长岁月，如今在手机页面、沉浸式展演场馆、文创周边以及虚拟空间中均有丰富呈现，人们看到的不只是技术的助力，更是文化不断延续的生命力。盛唐气韵曾滋养无数匠人的创作巧思，如今智能技术为这份古老美学开辟了全新的表达路径，使其在崭新叙事语境中能够持续镌刻属于当代的时代印记。

本文系2026年度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项目“从文物到场景：AIGC赋能唐代服饰纹样的文旅体验设计研究”(2026YB0172)、2026年度虚拟现实技术与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专项基金项目“‘AI生成+VR沉浸’融合的唐代服饰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研究”(VRLAB2026E02)、西安工程大学2025年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研究项目“基于XR的唐代服饰美育数智化场景适配实践研究”(25WYJGZD10)的阶段性成果。

深度老龄化社会白酒产业的转型路径

□宿迁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曹轩铭 张海彬

人口结构变迁是影响消费市场格局的深层力量。据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截至2025年末，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2365万，占总人口的15.9%。“十五五”期间将是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增长最快的五年。与此同时，白酒产业正经历深度调整。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6年1—6月，规模以上工业白酒产量同比下降4.7%，延续自2017年以来的下滑态势；上半年21家上市白酒企业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8.03%，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22.48%。

人口老龄化与白酒产业调整存在深层的结构关联。据中国酒业协会报告，2024年白酒消费者中50岁以上占比达58%，而35岁以下仅占12%，消费结构老龄化已成为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挑战。随着退休、退出职场、社会关系网络收缩，大量中老年消费者主动减少了白酒消费。如何在深度老龄化社会中实现白酒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亟待回答的重要课题。

一、深度老龄化对白酒产业的多维冲击

消费总量收缩与消费频次下降并行。老龄化对白酒消费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总量层面。传统白酒消费高度依赖商务宴请和社交聚饮场景，而老年群体退出职场后，这些场景自然萎缩，饮酒频次随之下降。2026年上半年行业进入“量价利齐跌”的深度收缩期，消费端的深刻变迁正成为驱动产业调整的核心力量。

消费价格带下移。上海证券报记者走访江苏、安徽多地终端市场发现，白酒主流价格带已由高峰期的400元至500元下移为100元至300元，消费者开始比较价格，也更在意一瓶酒是否适合眼前的饭局。

产业集中度加速提升。在总量下行背景下，头部虹吸效应进一步加剧。2026年上半年，营收前五名白酒企业在19家A股白酒上市公司总营收中占比从上年同期的80.02%提升至82.66%，净利润占比从88.44%提升至91.18%。大量中小酒企面临市场出清压力。

二、白酒产业应对老龄化的转型路径

（一）产品端：健康化与低度化转型

老年消费者对健康的关注度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群体，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主动转向低度白酒，出于健康考虑倾向于选择更低度数的产品。中国酒业协会及《中国养生酒发展白皮书》数据显示，其消费主要涵盖保健酒、露酒等药食同源酒品的健康酒市场，2020年市场规模约300亿元，2025年达到800亿元，6年复合增长率约20%~22.7%，在酒业品类中增速最快。酒企业应加大草本露酒、养生配制酒等品类的研发力度，面向老年群体开发兼具品质与健康属性的产品矩阵。

（二）场景端：激活银发消费新场景

白酒产业需要重新审视银发群体的消费潜力。社会学家Thurnell-Read(2024)通过质性研究发现，老年人饮酒行为在家庭共饮和与朋友聚餐等社交互动中占据重要地位。相关研究发现，功能、社会和情感价值均对老年消费者的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但是银发群体的酒类消费逻辑更为内敛和深刻。企业应围绕社区小聚、家庭晚酌、文化雅集等场景构建新的消费生态，推动产品从“应酬标配”向“生活点缀”转变。

（三）渠道端：数字化赋能精准触达

数字化手段为白酒产业精准触达银发消费群体提供了新的可能。企业应利用数字化手段强化消费者触达，依托大数据分析实现数据驱动营销决策，提升渠道效率。针对银发群体，应注重操作的简便性，将线上便利与线下品鉴相结合，降低消费门槛。

（四）国际视野：拓展海外增量市场

华泰证券研报指出，日本清酒行业的核心启示并不在于销量反转，而在于传统酒种如何在总量收缩中通过品质分层、品牌表达、场景运营、海外拓展和新客群培育实现价值重构，这对中国白酒产业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当前白酒出口仍以文化认同为主要驱动力，海外市场拓展空间巨大。企业应加强国际化标准体系建设，推动建立国际通认的白酒标准体系，助力中国白酒更好走向世界。

三、政策支撑与产业生态优化

2026年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酿酒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2030年)》，明确提出“适应市场需求新变化，实现高质量发展”，为白酒产业转型提供了政策指引。

在产业生态层面，应加快建立国家级酒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推动基酒评定、质量溯源等数据标准化，构建“保护—创新—融合—出海”完整支持链条。行业协会应引导企业从“酒找钱”转向“酒找人”，推进传统营销模式重构，构建体验式消费新场景，遏制内卷式恶性竞争。

结 论

深度老龄化既是白酒产业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也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契机。面对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白酒产业须转向以品质提升、场景创新和精准服务为核心的价值深耕模式。在银发经济加速崛起的背景下，那些能够率先完成产品健康化、场景多元化、渠道数字化和品牌国际化布局的酒企，将在存量竞争中赢得先机。从更宏观的视角看，白酒产业的转型不仅是企业生存之需，更是传统优势产业在人口新常态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唯有在文化表达、产品形态、消费场景上完成系统性价值重构，才能真正跨越周期，实现产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让法治成为一人公司的创业底气

□中共苏州市委党校法律和文化教研室 朱 琳

一个人借助人工智能开发产品、承接订单，OPC(一人公司)正在让更多专业人才有机会走上创业之路。随着这类企业从入驻社区走向实际经营，合同怎么签、数据怎么用、成果如何保护，成为绕不开的问题。支持OPC发展，需要让法律服务与创业扶持同步到位。

一、法治保障让个人创新更有底气

人工智能降低了创业的技术门槛，法治则为创业者提供可预期的行为边界。一项设计能否合法使用，一份合同能否按约履行，直接影响个人是否愿意投入时间和资金。把这些问题说明白、处理好，才能使一时的创业热情转化为持续经营的信心。

OPC身后没有庞大的管理团队，一笔被拖欠的款项、一场权属不清的纠纷，都可能打乱经营安排。保障公平交易、畅通权利救济，有助于弥补小微主体议价和维权能力的不足。对制造业基础深厚的江苏而言，这也是让个人的技术专长更顺畅地进入产业分工、服务企业需求的必要条件。

二、小规模经营仍需补齐法治短板

围绕新业态的法治保障正在推进。2026年7月，江苏印发《江苏省人工智能OPC知识产权合规指引》，回应开源代码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权属等实际问题；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人工智能纠纷审判意见，进一步明确相关责任认定。眼下需要着力解决的是，如何把这些规则转化为创业者用得上的帮助。

目前，OPC在合同履约、知识产权、财税管理等方面风险比较集中。有的创业者把代码上线当作履约完成，却没有约定验收和付款条件；有的使用客户资料、开源代码时，忽略了授权范围；还有的公私账户混用，财务记录不完整。这些问题看似细小，业务增加后却可能相互叠加。

其中也有服务供给的原因。部分社区仍偏重场地和基础后勤，专业法律服务没有及时跟上。创业者遇到具体难题时，往往依赖网上模板或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难以判断是否适合自己的业务。只提醒“注意合规”，还不足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三、把法律服务落实到创业关键环节

创业起步时，应把主体选择和责任说明白。人工智能创业语境下的OPC，与公司法上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并不完全重合，不能仅凭“一人公司”的名称判断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的，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登记辅导应据此延伸到账户管理、资金往来和财务记录，帮助创业者把经营与个人生活的账分清。人工智能参与经营，也应按创业者的实际角色明确责任，指导其在对外发布和交付前做好必要核验。

进入交易后，法律服务要围绕具体项目展开。依托已有合规指引，为软件开发、工业设计、内容制作等业务提供可调整的合同条款，把需求变更、验收期限、付款节点和成果归属约定清楚。对客户数据、模型和素材，提示核验来源与许可条件；对人机协同创作，指导保存能够体现个人创作贡献的记录。对符合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OPC，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帮助其依法应对拖延付款，避免“拿到订单却收不回款”。

这些服务需要有人持续提供。可依托现有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由社区收集需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律师定期驻点等方式，提供负担得起的咨询和审查。高校可以结合技术实践和创业教育，开展合同、知识产权等案例教学。智能工具适合辅助查询和初检，复杂事项仍须由专业人员复核。当出现纠纷时，要及时衔接调解、诉讼等救济渠道，减少创业者反复求助的时间成本。

监管也应把握好分寸。对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行为，依法适用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并做好针对性指导。执法指导应说明违法行为、整改要求和办理程序，帮助创业者及时纠正问题。对社区的评价应更多关注合同问题是否得到解决、法律咨询能否及时回应，将服务中的共性难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持续更新业务指引和服务清单。

医养结合协同治理：打通老年人连续照护服务链条

□百时美施贵宝 刘 玉

人口深度老龄化背景下，健康老龄化已经成为保障民生福祉、推进健康江苏建设的重要命题。健康老龄化的核心，不在于单纯治疗老年疾病，而是维护老年人的功能能力，实现医疗、康复护理、养老照护之间的服务接续。现实当中，虽然各地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纷纷开展合作签约，但很多老年人出院之后，医疗照护和居家养老服务之间仍然存在明显断点。机构签了合作协议，不等于老年人就能拿到连续的服务，不少协调矛盾与转接成本，最后变相转移到老年人及其家庭身上。破解这一现实难题，需要跳出简单的机构合作思维，从协同治理角度理顺责任划分、成本补偿与评价反馈机制，真正打通老年群体连续照护服务链条。

近年来，国家层面先后出台多份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养老服务改革、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相关政策，对多主体协同开展医养结合作出系统部署。江苏作为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省份，持续推进医养结合促进行动，加快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扩面落地，不断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推动医疗机构与养老服务资源对接。政策蓝图已经绘就，但宏观制度安排，需要转化为每一位老年人可落地的具体服务流程。很多时候部门之间目标存在客观差异：医疗机构侧重诊疗安全与床位周转，养老机构关注机构运营秩序，医保部门重视基金安全，基层还要承担大量其他公共事务。仅仅依靠一纸合作协议，缺少明确的交接规则、异常处置路径，就容易出现“只递交转诊材料，不确认接收落地”的现象，造成服务责任悬空。

协作过程产生的人力投入，如何得到合理补偿，是医养协同能否持续运行的关键。开展联合评估、制定个体化照护计划、开展转诊对接、跟踪服务落实，都需要工作人员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然而在现有制度下，承担协作工作的机构，未必能够匹配对应的经费补偿，协作带来的收益却往往由别的机构或者老年人家庭享有。这种投入与收益相互分离，会削弱机构持续开展协同服务的动力。随着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加快落地，江苏不断完善长护险评估、待遇支付规则，为医养服务衔接提供新的制度工具。但也不能简单寄希望于“打包付费”解决全部协同问题，不同类型服务分属诊疗、长期照护、养老保障不同制度框架，各类基金不能随意混同使用，支付激励设计必须兼容现有医保、长护险政策规则。

我们还要厘清一组容易混淆的关系：机构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并不等同于老年人真正享受到连续照护。签约共建、搭建信息服务平台，都只是协同的基础条件。一份转诊申请发出，如果没有明确谁确认接收、转接失败如何处置，那么平台就只能记录问题，不能解决问题。对于失能、认知障碍、居住偏远又缺少家庭照护者的老年人，服务链条任何一环断裂，都会把协调对接的压力全部交给家属。数字化信息平台可以提升效率，但技术本身不会自动带来服务协同，如果缺少配套的责任机制，平台也容易沦为“信息台账”。

与此同时，现有考核评价体系也存在一定的导向偏差。在实践中，床位数量、机构签约数量、平台建设情况，这类容易统计的指标常常被用来衡量医养结合工作成效。但这些指标只能反映“具备合作条件”，不能代表老年人已经获得连续照护。如果绩效考核只鼓励看得见的服务数量，机构就缺少动力投入复杂的沟通协调、个案跟进这类难以量化的工作。健康老龄化视角下，老年照护成效不能简单用“完全恢复自理能力”来评判，延缓功能衰退、减轻痛苦、减轻家庭照护负担，同样是重要的服务目标，评价体系需要兼顾过程与实际的服务结果。

完善医养结合协同治理体系，要抓住责任可识别、成本可补偿、结果可核验这三个关键点，在保留各个机构专业分工边界的前提下，打通服务衔接堵点。

第一，以共同照护目标统合各部门工作任务。协同治理应当立足老年人实际照护需求，而不是机构既有项目。在县域层面，把卫健、民政、医保部门的工作任务，对应到具体老年人群的照护事项上。面向个体老人，结合功能状态、疾病风险、家庭照护能力以及本人意愿，形成个体化共同照护目标。照护目标不能“一刀切”，对不同老人可以分别侧重维持独立生活、预防失能加重、做好安宁照护等不同方向，充分尊重老年人选择权。不能简单以家庭存在照护人员，就推定家庭可以承担全部专业服务协调工作。共同照护计划力求简洁，聚焦跨机构协作重点事项，避免重复建设大量档案台账。

第二，依托县域统筹和个案协调，把交接责任落到实处。县域是衔接基层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的重要枢纽。县级层面可以建立跨部门问题处置清单，梳理医养衔接高频事项，厘清各部门权责边界，涉及定价、基金管理等权限的，则上交对应主管部门处理，不盲目新增机构、叠加管理层级。在服务落地层面，设置个案协调人员，可以依托家庭医生团队、机构护理人员，专门负责确认需求受理、核实接收机构服务能力、跟进服务状态。协调人员只承担对接跟进职责，不替代医护人员作出专业判断。每一次跨机构转接，都要明确发起条件、提交材料、接收确认方式、转接失败替代路径，只有接收方确认并且实际启动服务，才算完成本次转接，杜绝材料一转了之。

第三，落实分账支付机制，对必要协作成本予以合理补偿。做好医养协同，首先要分清诊疗服务、长护险护理、基本养老服务各自资金来源，在各自制度框架内结算，不随意混用不同基金。联合评估、转诊追踪这类协作工作，优先核查是否已经纳入现有岗位经费、项目经费，避免重复收费。对于确属公共服务性质、尚未得到补偿的协同工作，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机构内部绩效分配等方式予以保障。属于医保、长护险覆盖的服务，严格遵循目录与审核规则，不能单纯为促进协同随意扩大基金支付范围。面对重度失能、认知障碍老人，要正视服务成本差异，同时做好质量监管，防范出现机构拒收高需求服务对象的现象，兼顾基金安全与服务公平。

第四，坚持最小必要信息共享，守住专业角色边界。信息共享只为完成具体照护事项，只调取必要的健康风险、用药、功能状态、照护计划等信息，做好权限管控、操作留痕，不能无限制调取全部病历资料。不同制度下的评估各有定位：医疗评估服务临床诊疗，养老能力评估服务照护安排，长护险评估用于资格认定，不追求“一次评估通办全部业务”，可以共享基础资料，但保留必要独立审核和申诉渠道。数字工具不能完全替代线下服务，保留纸质交接、人工协助的渠道，弥合老年人数字鸿沟。医护人员、养老护理员各司其职，在各自资质范围内履职，农村地区可以用巡诊、固定联络人、远程专业支持相结合的模式补齐资源短板。

第五，构建过程与结果并重的评价改进机制。转变过去重建设指标、轻实际体验的评价导向，不能把机构签约数量、平台上线情况直接等同于服务成效。评价重点应当落脚到老年人真实体验上：转接完成率、服务等待时长、照护计划落实情况、家庭反复跑腿协调的负担，以及未被满足的照护需求。设置科学可操作的统计口径，区分因供给不足、老人主动放弃、病情变化带来的服务中断，不能全部归责为机构协作失败。对服务效果开展分层评价，结合老人失能基线、家庭条件综合判断，不能简单地把医疗费用下降当成协同成功。从评价结果反馈到流程优化、资源配置，形成闭环改进。

推进医养结合协同治理，不宜追求一步到位，建议优先选择失能老人出院接续护理、养老机构慢性病管理等高频场景开展试点，先理顺流程，再拓展服务范围，切忌先建设复杂信息平台，制度流程却没有跟上。在基层服务供给薄弱的地区，优先保障基础接续服务，不照搬发达地区高密度服务模式。协同治理不是要取消机构专业分工，而是完善组织边界之间的交接规则，把协调成本从老人家庭转移到制度流程内部，真正实现健康老龄化的民生目标，为健康江苏建设夯实老年照护的制度根基。